

香港教育國際化的近年發展

胡少偉

香港教育大學 國際教育學系

摘要

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這個中國特別行政區定位為一個亞洲國際都會，是全球的金融、商貿和航運中心。培育具國際競爭力的人才營運這國際都會，香港教育要有適度的國際化。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推動教育國際化，其中一個策略是為中小學生提供學習英文的機會。為了分析香港教育國際化的近年發展情況，此文對香港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境外研究生、國際學校、國際文憑課程及學生交流等五方面作出論述，從而探討香港教育國際化特色及其面對的挑戰。

關鍵詞

教育國際化、教育國際化在香港、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香港教育發展

香港教育要有適度的國際化

上世紀七十年代起，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並成為一個國際貿易旅遊城市。1997 年中國恢復香港主權後，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這個中國特別行政區定位為一個亞洲國際都會，是全球的金融、商貿和航運中心。據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截至 2018 年底，香港共有 152 家持牌銀行，其中 145 家由香港境外的機構實益擁有（香港特區政府，2019）。在商貿方面，由投資推廣署及政府統計處共同進行的 2019 年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統計顯示，海外及內地的駐港公司由 2017 年的 8,225 間增 9.9% 至 2019 年的 9,040 間，其中有 1,541 個地區總部及 2,490 個地區辦事處；這些海外及內地公司的總就業人數達 49 萬 3 千人。在航運方面，香港 5 小時飛行航程範圍能抵達全球一半人口所居之處和亞洲主要市場，以國際乘客量和國際空運貨物處理量計，香港國際機場是世界最繁忙機場之一，香港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貨櫃港之一。可見，香港教育要有適度的國際化，以培育人才營運這國際金融、商貿和航運都會。特區政府推動教育國際化的一個策略，是為所有中小學生提供學習英文和說英語的機會。2001 年推行課程改革時，特區政府明確英國語文教育為八個學習領域之一；按 2002 年《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全港公營中小學校安排 17-21% 課時用於學習英文科。為保障新高中學生在國際社會的出路，教育局和考試及評核局於 2012 年推行中學文憑試前已獲 130 間在澳洲、加拿大、英國及美國的高等教育院校接納可作為入學申請；至 2019 年，全球超過 280 間高等院校歡迎修讀香港中學文憑試的學生申請入讀。為了分析香港教育國際化的近年發展情況，此文對香港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境外研究生、國際學校、國際文憑課程及學生交流等五方面作出論述，從而剖析香港教育國際化特色及其面對的挑戰。

高等教育國際化

在上個世紀，香港高等教育學額供不應求；「九十年代的大眾型高等教育階段，香港還有近半的年青人因未能入讀本地高等院校而遠赴海外留學」（胡少偉，2017，頁 57）。當時高等教育國際化在香港並沒有成為一個政策關注，在這個世紀面對全球一體化的時代需要，大學資助委員會於 2004 年在《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長・與時俱進》才明確指出，香港高等教育應被視為區內和國際高等教育的

一股力量。其後，「特區政府於 2006 年成立一個高層次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檢視促進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相關策略，以配合發展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的願景」（盧一威、伍世傑、韓笑，2016，頁 47）。但不容忽視的是，在香港政府推動高等院校開放收生的同時，香港部分青年卻因高等教育學額不足而要出外留學，「在 2014 香港出外留學人數超過了本地高等教育學額的 20%，同時亦佔了適齡就讀高等教育人口的 7%」（Oleksiyenko, Cheng & Yip, 2013，頁 1083）。可見，每年出外進修高等教育的留學生依然是數以千計的；這亦是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個特點。

在這段期間政府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個重點策略，吸引多些境外生入讀香港八大資助院校。「非本地生佔八大資助院校學士課程由 1996/1997 年度佔 1%，增加至 2012/2013 年的 12%」（Lo & Tang, 2017，頁 60），至 2015-2016 學年非本地學生人數進一步提高至佔 15.75%，當中有約八成是內地學生。正如學者 Cribbin (2015) 分析「催化內地學生赴港升學的兩個原因，一是香港高等院校與很多國際大學有伙伴關係，一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中國城市對內地學生和父母有吸引力」（頁 20）。為了回應香港高等教育內地化的批評，八大資助院校近年來積極吸引其他國家學生入讀，使內地生在非本地學生人數的比重從 2010-2011 學年 88% 降至 2015-2016 學年的 76%，這是特區政府重視提升非本地生生源多樣性的成果（廖青，2017）。再者，由 2016/17 學年起修讀資助大學課程的非本地新生，須通過核准資助學額指標以外的超收方式錄取；「在 2018/19 學年約有 18,000 名非本地學生修讀各級教資會資助課程，佔總體學生人數約 18%」（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9，頁 56）；而這佔比仍較教資會核准的收生額 20% 為低。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處（2017）指出國際化有多種形式，包括國際策略、課程、課程發展、國際網絡、非本地學生的招收及融合、國際的教職員等，教資會一向鼓勵各大學以適合本身的形式推行國際化，並且會繼續這方面的工作。其中香港高等院校國際化成功的另一明顯因素，是在全球招聘國際上有競爭力學者出任大學教師。據黃發來（2016）文獻指出：香港大學的 1,400 多名教師中 99% 的人有國外學習經歷，外籍教師佔比近 50%；香港科技大學的教師來自近 30 個國家，其中不乏美國兩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的外籍教師比例也超過 30%（頁 996）。2019 年 5 月，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亞洲大學排行榜，香港科技大學連升兩級位列亞洲第三，連同排第四的香港大學一起位列亞洲大學排行榜的前列。據國際高等

教育資訊機構 (QS) 於 2020 年 3 月公布世界大學學科排名，香港八大資助院校打入全球前 50 的學科達 76 科，可見香港高等院校課程在國際上有一定聲譽，其成功之一是各院校課程設置強調與國際接軌；為保證課程的先進性和前沿性，香港高校課程均採用國外原版教材，並採用英語授課。再者，「為了開闊學生的國際視野，增加對多元文化的認同感，香港高校開設了與國際接軌的通識教育課程，內容涉及世界歷史、世界地理、世界各地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等」（顏軍梅、萬波，2014，頁 94）。簡言之，香港八大資助院校的重視跨境收生、在國際社會聘優秀學者和保證專上課程與國際接軌等三策略，均是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成功的因素。

境外研究生

正如教育局高怡慧（2016）指出「一個集合來自不同區域學生，擁有多元文化的學習環境，有助加強文化交流、擴闊本地學生的視野，讓他們更具國際競爭力。」為了吸引多些跨境生入讀香港高校，各院校制定周詳的招生政策，尤其是關注那些發展迅速、對優質高等教育需求甚多的亞洲國家；「政府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和貿易發展局的全球辦事處網絡，均積極協助大學海外招生，豐富大學的國際生來源結構」（宋佳、劉寶存，2019，頁 74）。因自費研究生課程不必受公帑課程非本地生不可多於 20% 的限制，香港八大資助學院研究課程的非本地學生人數的 2017/18 學年佔總學生人數超八成（見下表 1）；其中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均可吸引過千境外研究生入讀自資研究生課程。可見香港高校研究課程在國際上極具吸引力的，其中內地生有三分之二，佔相關研究生課程學生的 67.4%。

表 1：2017/18 學年按大學及原居地劃分修讀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非本地學生人數

學年	大學	原居地			學生人數	
		內地	亞洲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	非本地生總計	總學生人數
2017/18	香港城市大學	691	113	99	903	997
	香港浸會大學	158	14	20	192	237
	嶺南大學	24	13	16	53	79
	香港中文大學	1,421	58	41	1,520	2,011
	香港教育大學	41	10	4	55	76
	香港理工大學	506	76	68	650	764

2017/18	香港科技大學	966	181	80	1,227	1,461
	香港大學	1,309	109	104	1,522	1,970
總計		5,116	574	432	6,122	7,595

內地學者陳艷蘭、馮軍娟（2016）分析指香港院校的研究生教育時，指出「從師資、生源、課程、科研、學生交換、學術交流、合作辦學、信息溝通、圖書資料到就業去向等方面都是面向世界，國際化程度很高」（頁 93）。香港高校國際化程度高帶來了集聚效應，「一流世界大學必將吸引一流國際學生和一流師資；反之，一流師資又會帶來一流的科學研究，且世界教育強國更願意與之強強聯合」（夏雪艷、黃磊，2017，頁 71）。香港院校研究課程生源的國際化，有益於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從而亦提高了這些院校的國際聲譽。正如內地學者褚宏啟（2019）提出「教育國際化不是單向的、被動的，而是雙向的、互動的、主動的；教育國際化包括兩層含義，國際教育的本土化和本土教育的國際化」（頁 58）。香港一方面吸收國際高等教育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積極將研究生課程收生國際化，充份體現出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是雙向並重的。

國際學校

為了照顧在港定居的海外家庭及因工作或投資來港居住家庭子女的教育，及方便香港有意往外地升學學生的適應，國際學校早於上個世紀便在香港存在。根據教育署於 1995 年提供國際學校名額工作組的報告，當年全港有 24,589 個就讀國際學校的學生，當時並預估到 2000 年需增加 7,400 個國際學校學額，即 5 所非牟利學校 (Education Department, 1995)。雖然香港國際學校學額持續地增加，但因學額不足，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於 2012 及 2013 年討論進一步增加國際學校學額；據教育局於 2012 年 2 月向教育事務委員會的資料，當年全港有 47 所國際學校，提供不同的非本地課程，包括美國、澳洲、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及國際文憑等不同國家或國際課程。「在 2011-2012 學年，這些學校提供合共約 37,000 個學額」（立法會秘書處，2013，頁 58）；這些國際學校學額除有利吸引國際人才到港就業和生活外，亦對香港教育國際化產生了促進作用。為增加香港國際學校的學額，教育局於 2014 年 4 月啟動新一批國際學校的分配，邀請辦學團體於是年 5 月底前就大埔、將軍澳、鴨脷洲的兩幅空置校舍及三幅土地提交意向書，提供

1,300 多個國際中小學校學生學額（立法會秘書處，2015）。可見，提供足夠的國際學校學額給各國在港學生入讀，是香港政府維持教育國際化的一個措施。

2014 年 9 月統計資料顯示，香港國際學校提供 22,326 個小學學位及 18,631 個中學學位供報讀；香港現行的政策是透過校舍分配而獲分配空置校舍或土地營辦的國際學校須取錄不少於 70% 的非本地學生。「近年在國際教育界的討論中，更多學者關注從全球、國家、地方三個層面的互相融合和滲透去認識教育國際化的過程，以致出現了一個三者集於一體的新詞 glonacality（全球—國家—地方性）」（劉劍青、王小飛，2015，頁 21）。香港國際學校現況體現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與內地教育的不同，也是一個集全球國家在地性三者於一身的國際教育現象。按特區政府資料，透過 2013 年及 2015 年校舍分配工作的 8 所新建的國際學校，自 2014/15 學年起陸續運作並逐步提供約 6,000 個新的國際學校學額。據下表 2，香港 54 所國際學校於 2019/20 學年提供 46,388 個學額（不包括特殊學校），比 5 年前增加一成多，較回歸前的學額更增加了二萬多；是年香港的國際學校收錄 41,133 學生，當中的非本地學生佔整體人數的 76%，本地學生佔 24%，合乎七成以上非本地生的國際學校政策，亦有效地向國際家庭子女提供需要的國際化教育服務。

表 2：香港國際學校的統計資料（2018/19）

	2018/19
小學	19
中學	8
中學暨小學	25
特殊學校	1
提供的學額數目（不包括特殊學校）	46,388
學生人數（不包括特殊學校）	41,133
非本地學生百分比	76%
本地學生百分比	24%

香港的國際學校（2020）

國際文憑課程

為便於國際間移動家庭子女在各地入學，國際文憑組織（IBO）於 1968 年成立並提供全球認可的課程，其大學預科課程（DP）早已成為各地國際學生考取大學的選擇。IBO 指出 21 世紀的生活處在一個相互緊密聯繫的經濟全球化的世界，要求人們具備批判性思維技能和國際心；所以，IB 課程注重促進跨文化理解和互相尊重（彭敬慈，2016）。國際文憑組織使命宣言是：旨在培養積極探究、知識淵博、關愛他人的年輕人，以跨文化的理解和尊重為基礎，幫助創建一個更好的、更超平的世界；IB 課程的理念切合香港這個國際都會，提供 IB 課程的國際學校和直接資助學校持續增加。至 2020 年 4 月在 IBO 的網頁，香港有 66 所學校提供國際文憑課程，當中有 40 間學校提供小學課程（PYP）、13 間學校提供中學課程（MYP）、33 間學校提供大學預科課程（DP）和 6 間學校提供專上課程（CP），有 7 所學校同時提供中小名預科課程（IBO, 2020）。

為了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IBO 提出推行 IB 課程的學校須建立一套價值觀，以讓學生成為一名具國際視野的公民；並經常提供機會給任教 IB 課程的教師參加工作坊、講座和展覽會等專業培訓。而這些專業培訓在世界不同地方舉行，各地 IB 教師到異地學校參觀並與各地受訓的 IB 教師作交流，開闊國際視野，從而為 IB 學生提供適應全球一體化的課程和學習活動。在 2019 年，香港有 2,284 名同學應考 IBDP，平均分達 35.99 分，較全球平均 29.62 分高出 6.37 分（頭條日報，2019）；而是年 IB 滿分的狀元，在港最少有 34 名，佔全球 IB 狀元人數的 16%。當中有一個教育國際化趨勢值得關注的是，香港有 14 所受政府資助的直資學校開辦非本地課程（見下表 3）；其中超過一半即八所直資學校是開辦 IB 的，有 598 名考 IBDP 學生，佔全港應屆 IBDP 考生的 26.2%。容許受公帑資助學校辦國際化的 IB 課程，是香港基礎教育國際化的一個特色。

表 3：2018/19 學年直資學校就讀非本地課程的學生數目及佔該校學生總人數的百分比

學生名稱	非本地課程	就讀非本地課程的學生數目及其佔該校學生總人數的百分比 2018/19
港青基信書院	英國普通教育文憑高級程度考試課程	122(15%)
拔萃男書院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119(9%)
聖保祿學校	英國普通教育文憑高級程度考試課程	113(10%)
聖保羅男女中學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102(8%)
聖士提反書院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94(10%)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86(8%)
啟思中學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84(1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61(13%)
拔萃女書院	英國普通教育文憑高級程度考試課程	34(3%)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英國普通教育文憑高級程度考試課程	33(4%)
保良局顏寶玲書院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33(4%)
聖保羅書院	愛德思國際高級程度課程	20(2%)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19(3%)
培僑書院	英國普通教育文憑高級程度考試課程	4(<11%)

（教育局，2019a）

學生交流

內地著名比較教育學家顧明遠（2011）指出，「教育國際化是全球性的，也是雙向的，我們既要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成果，也要把中國文化介紹到世界，促進國際間的相互交流」（頁 24）。在全球一體化過程中，各地越來越重視培育學生具備專業知識的同時，須擁有國際視野與人合作溝通的能力；2014 年《亞太經合組織第 22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宣言》承諾推進跨境教育合作，認識到學生、研究人員、教育提供者的流動有助於加強區域聯繫，促進人文交流、並通過知識和技能的傳播推動經濟發展（劉寶全、劉強、荊曉麗，2015）。在 2014/15 學年，香港八大資助

院校接收了約 5,600 名學生來港到交流；「同年，約 6,200 名本地學生到香港以外地區參與交流活動，即是說每四名本科生中便有一名有機會於在學期間出外交流」（教育局，2016）。可見，香港政府重視推動大學生交流，大學生在交流過程中擴闊國際視野，並將中國文化和香港的特色帶到世界各地的交流院校。為確保專上學生不會因經濟困難而未能參加交流活動，教育局由 2015 年 1 月起推出專上學生境外交流資助計劃；根據下表 4 資料，香港政府於 2016/17 及 2017/18 兩學年共資助了 2,665 名大學生參與境外交流學習活動。其後，教育局於 2016 年 7 月推出專上學生前往「一帶一路」地區交流資助計劃，以鼓勵和資助有經濟需要的本地學生到「一帶一路」地區交流。

表 4：專上學生境外交流資料計劃（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第二個資助期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 受資助學生人數	第二個資助期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 批出資助金額 (港元)	第三個資助期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受資助學生人數	第三個資助期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批出資助金額 (港元)
1,408	28,364,329	1,257	26,804,927.26

(教育局，2019a)

除了推動大學生交流之外，特區政府亦讓中小學生有境外交流經歷，訂下了資助學生最少有一次跨境交流的措施，使香港中小學生透過親身體會從多角度認識內地歷史、文化、經濟等多方面的發展，以鞏固和深化課堂學習，並思考香港在國家發展的機遇和挑戰。相關的內地交流計劃包括了：「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同行萬里」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初中及高小學生交流活動資助計劃：「赤子情・中國心」、高中學生交流活動資助計劃、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以及一些主題式內地交流計劃。為了提高香港中小學生的跨境視野，教育局在 2015/16 至 2017/18 學年推行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並委託獨立顧問檢討試辦計劃的成效；檢討顯示大部分受訪學校對試辦計劃評價正面，認為有助加強師生對內地教育的了解、促進兩地文化交流、擴大學校網絡、提升教師專業水平，以及擴闊學生視野。因此，教育局由 2018/19 學年起把這計劃恆常化，為每所與內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的本地公營及直資學校（包括特殊學校），提供經常津貼由 12 萬提高至 15 萬；截至 2019 年 3 月，申領姊妹學校計劃津貼的學校共有 626 所，可見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受到不少香港中小學的支持，從而令香港中小學生擴闊

學習經歷和具跨地域視野；這亦是香港教育國際化在全球國家在地化三位一體的另一例證。

香港教育國際化特色與挑戰

在全球一體化的年代，各地教育部要肩負培育學生樂於一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香港作為一個位於亞太的中國國際都會，其教育國際化是有必要性的。香港特區政府一向重視高等院校的國際化，故八大資助院校國際化程度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研究生課程因不受大學資助委員會政策所限，其國際化程度之高產生了集聚效應和雙向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成功經驗。在基礎教育階段，香港有兩個例子體現了全球國家地方性（glonacality）三者於一身的教育國際化現象，其一是在港有 54 所國際學校提供不少於 10 個國家或國際課程，供居港非本地生入讀；與此同時，香港國際學校及直資學校近年提供越來越多的 IB 學額，2019 年有 2,200 多名 IBDP 考生，並得到較全球平均高的成績。再者，香港教育國際化另一特色是推動大中小學生參與交流活動；其中包括向有需要學生提供資助，並將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恆常化，以擴闊香港師生在一國兩制下的跨境視野。

與此同時，香港教育國際化亦面對一些新挑戰。雖然香港學生在 2018 年的 PISA 成績仍比國際平均水平為高，但正如聯校資訊科技學會聯合主席（2020）提出在 PISA 研究結果中，香港無論在成績或排位都相繼下滑，這是甚麼問題？值得香港教育界認真思考和研究，尤其是學生在科學的表現相對語文和數學能力為差，實需香港基礎教育界認真關注和改善的。另一個香港基礎教育國際化的議題，是八大資助院校於 2019 年取錄持國際文憑、普通教育高級程度證書等國際學歷的本地生達 1,700 多，佔整體學額近一成二，較 2018 年增 2%；這趨勢在社會上產生正反的爭論，值得關心香港教育國際化者進一步研究。在大學教育方面，「近年來香港部分大學熱衷於政治化，會對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帶來威脅和衝擊」（黃發來，2016，頁 42）；不知教育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八大資助院校會否就此作研究，以確保香港高等教育質素及維持其國際化程度。而令人欣喜的是，有鑒於本地學生入讀研究課程相對較少的情況，教育局在 2019 年施政報告政策措施中提出「政府將於 2020/21 學年起推出先導計劃，每屆向最多 1,000 名修讀指定研究院修課課程的優秀本地學生提供最高 12 萬元的獎學金，以吸引本地學生修讀有關課程」（教育

局，2019b，頁 4)；這措施有益於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及本地化的平衡，令香港大中小學的全球國家地方性的教育國際化特色更為明顯。

參考文獻

- Cribbin, J. N. (2015). Hong Kong as a regional education hub: Rhetoric or reality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7(2),1-24.
- Education Department (1995).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chool Places. Retrieved October,21,2020, from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about-edb/publications-stat/major-reports/intl_e.pdf.
-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2020). Find an IB World School (information for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Retrieved April,21,2020, from <https://www.ibo.org/programmes/find-an-ib-school/?SearchFields.Region=&SearchFields.Country=HK&SearchFields.Keywords=&SearchFields.Language=&SearchFields.BoardingFacilities=&SearchFields.SchoolGender=&page=4>。
- Lo, W. Y. W & Tang, H. H. H. (2017). Dancing with global trends: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1997-2012.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History*, 49(1), 53-71.
- Oleksiyenko, A., Cheng, K. M. & Yip, H. K. (2013).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in Hong Kong: private good, public good, or trade in services?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38(7), 1079-1101.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2004)。《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長 • 與時俱進》，2020 年 10 月 23 日，取自 https://www.ugc.edu.hk/doc/big5/ugc/publication/report/policy_document_c.pdf。
- 大學資助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2017)。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回應帳委會第六十七號報告書，2020 年 10 月 23 日，取自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2/15/P2017021500719.htm?fontSize=1>。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2019)。《教資會年報 2018-19》，2020 年 10 月 23 日，取自 https://www.ugc.edu.hk/big5/ugc/about/publications/report/AnnualRpt_2018-19.html。
- 立法會秘書處 (2013)。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國際學校學額的相關事宜。香港（立法會 CB(4)555/12-13(02) 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2015)。《教育事務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香港（立法會 CB(4)1231/14-15 號文件）。
- 宋佳、劉寶存 (2019)。〈香港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政策回顧與現實審思〉。《高教探索》，第 9 期，頁 68-74。

- 香港的國際學校 (2020)。〈國際學校資料一覽〉2020 年 10 月 23 日，取自 https://internationalschools.edb.hkedcity.net/statistics_at_a_glance.php?lang=tc。
- 香港特區政府 (2019)。〈金融財務〉。《香港年報》，2020 年 10 月 23 日，取自 <https://www.yearbook.gov.hk/2018/tc/pdf/C04.pdf>。
- 胡少偉 (2017)。〈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及國際化現況〉。《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第十六卷，頁 55-69。
- 夏雪艷、黃磊 (2017)。〈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研究—以國際化內容為維度的分析〉。《世界教育信息》，第 2 期，頁 67-71。
- 高怡慧 (2016)。〈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 同時增加本地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2020 年 10 月 23 日，取自 <http://www.edb.gov.hk/tc/about-edb/press/insiderperspective/insiderperspective20160418.html>。
- 教育局 (2016)。〈香港教育整體發展〉。《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7 月 2 日會議討論，立法會 CB(4)1181/15-16(04)》號文件。
- 教育局 (2019a)。〈就立法會審核 2019-20 財政年度開支預算的初步問題的書面回覆〉。2020 年 10 月 23 日，取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 教育局 (2019b)。〈2019《施政報告》教育局的政策措施〉。《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9 年 11 月 1 日會議討論文件》。
- 陳艷蘭、馮軍娟 (2016)。〈香港碩士研究生教育的特點與啟示〉。《大理大學學報》，第 1 卷，第 5 期，頁 90-94。
- 彭敬慈 (2016)。〈香港教育的國際化〉《中國教師》，第 8 期，頁 10-14。
- 黃發來 (2016)。〈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歷史與現狀〉。《大學 (研究版)》，第 9 期，35-44。
- 廖青 (2017)。〈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打造區域教育樞紐的比較研究〉。《比較教育研究》，第 11 期，頁 16-25。
- 褚宏啟 (2019)。〈我們需要有實效低成本的教育國際化〉。《中小學管理》，第 7 期，頁 58。
- 劉劍青、王小飛 (2015)。〈教育國際化內涵及政策定位〉。《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第 5 期，頁 21-26。
- 劉寶全、劉強、荊曉麗 (2015)。〈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教育領域優先發展議題及其展望〉。《比較教育研究》，第 3 期，頁 1-9。

盧一威、伍世傑、韓笑 (2016)。《香港高等教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頭條日報 (2019)。〈2019 年全港各校 IB 預科課程成績總覽〉2020 年 10 月 21 日，
取自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632541/%E5%8D%B3%E6%99%82-%E6%B8%AF%E8%81%9E-%E5%8D%87%E4%B8%AD%E9%81%B8%E6%A0%A1-%E5%90%84%E6%A0%A1IB%E9%A0%90%E7%A7%91%E8%AA%B2%E7%A8%8B%E6%88%90%E7%B8%BE%E7%B8%BD%E8%A6%BD-%E4%BA%8C%E4%B9%8B%E4%BA%8C>。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聯席主席 (2020)。〈教師視角：教育制度的反思 PISA 告訴我們甚麼？〉。《教育專業》，第 10 期，香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頁 16-19。

顏軍梅、萬波 (2014)。〈地方高等學校國際化發展策略〉。《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 31 卷，頁 93-96。

顧明遠 (2011)。〈教育的國際化與本土化〉。《世界教育訊息》，第 4 期，頁 22-25。

Recent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iu Wai WU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PRC is positioned as an Asian cosmopolitan city and a global financial, commercial and maritime center. Foster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personnel operating this international city, Hong Kong should hav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modest. The HKSAR Government has been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one strategy i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ive aspects, i.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verseas graduat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ternational diploma courses and student exchanges, so a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s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s it faces.

Keywords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Education